

读杨慎诗札记

王文才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成都会议期间，曾亲手精选了《诗若干首·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文字依据清人沈德潜的《明诗别裁》，共录杨基、杨慎、李攀龙、谢榛等十二家诗十九首。诸家风调不同，各有佳胜，而以杨慎入选的诗为最多（凡八首，内并包括其夫人黄氏一首）。杨慎是明代著名的学者、诗人，在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中，遭到了打击，长期谪戍云南至死。《明史》本传指出：“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第一”。《列朝诗集》小传说他的诗：抗衡七子，别张壁垒，“沈酣六朝，揽采晚（当作初）唐，创为渊博靡丽之词”。这都代表明清人一致的看法。他对后代学术思想和诗歌发展，有过重要的贡献和影响。入选的这几首诗，都作于明世宗嘉靖三年（1524）“议大礼”谪戍之后。既处于罪废的困境，而世宗又“每问杨慎云何”，诗篇往往用意深微。他平素论诗，崇尚自然蕴藉，滇中故实前人更少使用，致使读者对此产生纷歧的理解。兹试为疏释，亦未必尽当。

宿金沙江

往年曾向嘉陵宿，驿楼东畔阑干曲，江声彻夜搅离愁，月色中天照幽独。
岂意飘零瘴海头，嘉陵回首转悠悠，江声月色那堪说，肠断金沙万里楼！

嘉靖十七年冬，杨慎从云南第四次回四川，奉军令“黎州勾当，便道还乡”。十月从环州入蜀，明年离蜀返滇，往来都经过金沙江。《滇程记》载：“达滇有三路，自邛、雅、建昌、会川渡金沙江，入姚安、白崖曰古路，唐曰姚嵩路。”即《野获编》卷二十四“入滇三途”的北道。明时这条道路已非官道，惟有商旅行走，《徐霞客游记》称之为废道。杨慎投宿丛山小驿中，因忆早年夜憩嘉陵江畔，江声月色，景色相似。当时已感离乡孤独之苦，今谪戍远边，夜宿荒江，心情更为难堪。诗意亦分为两层，以今昔行旅，对写离愁。王夫之《明诗评选》卷二特别称道它的篇法：“只两段，自开合。歌行最忌者意冗，钩锁密也。”

嘉陵驿楼在广元县嘉陵江畔。《蜀中名胜记》卷二十四：“古嘉陵驿在（广元）治西一里，后魏嘉川县设焉。唐姚鹄《嘉川驿楼晚望》诗：楼压寒江上，开帘对翠微。”

明时驿楼亦临水而立，终夜可闻江声。“搅离愁”句，万历刊本《升菴文集》三种皆同，用《小雅·何人斯》飘风搅心的意思。句法略似元稹《宿嘉陵驿》：“一夜嘉陵江水声”；杜牧《齐安郡中偶题》：“秋声无不搅愁心。”《明诗综》卷三十四改“搅”为“动”，似嫌搅字太重，改作动字。朱彝尊编选前人诗词，每病以意删改，不足为据；其文字的真实性，远不如《列朝诗集》，但也有个别改易处，远胜原作。

瘴海头指金沙江上，这次旅程同时所作的《犯星歌》中，有“梦里曾游瘴海边”句可证。按《永乐大典》站赤条引《经世大典》：“至元二十八年三月十七日云南行省言：中庆经由罗罗斯，通接成都陆路，见立纳怜等二十四站。其相公岭雪山、大渡河毒龙瘴气、金沙江烟岚，自建都、武定等路分立站赤，夏月人马不能安止。”烟岚即烟瘴，明时记载，金沙江“有岚瘴，隆冬人过，虽袒裊皆流汗”。当地气温异于川滇，路僻人稀，过客每因病至死，旧传为“温暑毒草之地”，故云“飘零瘴海”。

三岔驿

三岔驿，十字路，北去南来几朝暮。朝见扬扬拥盖来，暮看寂寂回车去。
今古销沉名利中，短亭流水长亭树。

杨慎《滇程记》载：白水驿一名三叉路，在南宁驿东。今属霑益，为云贵交通必经之处。他谪滇后，屡次回反川南，行经此驿。清代顺康年间，程封先后作南宁令，守曲靖府，去任时有《三岔驿》诗云：“藩西桥南官道北，我骑款段常迎客。”诗后附录此篇，因知慎作当属曲靖，不能移于他处。

这个驿亭，首当滇程，不知有过多少官吏朝来暮去。此诗即以讽刺那些利禄之徒，奔名逐利，朝得暮失的卑鄙心理。犹苏轼《纵笔》：“谿边古路三岔口，独立斜阳数过人”之意，表现较为清醒的高超态度。当然，用利名二字概尽古今历史，俱视为“万古消沉在此中”，不免出于一时的偏激之情，但用以专指名利薰心、浮沉宦海之辈，倒也比较恰切。

末句讽意，著笔幽微。历来那些“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为自得的人，连个泡影也没有了，正如李白所说，“古人今人若流水”。留下的，只有长亭树阅人多矣！（姜夔词）

杨慎另有《北桥书感》诗，其内容可与本篇相互发明：“北桥边，沙棠树；曾记将军射角时，还忆台评醉歌处。廿载经过寻旧游，百年华屋已山丘。寄言冉冉征途者：奔走风尘何所求！”

锦津舟中对酒别刘善充

锦江烟水星桥渡，惜别愁攀江上树；青青杨柳故乡遥，渺渺征人大荒去。
苏武匈奴十九年，谁传书札上林边？北风胡马南枝鸟，肠断当筵蜀国弦！

嘉靖本《南中集》卷六载此诗，无题首六字，《文集》本补出，有助于了解写作的背景。嘉靖二十年，杨慎回成都参加修纂省志的工作，十月反滇，发沱江至泸县，因病回成都，明年七月重返戍所，详简绍芳《升庵先生年谱》。从出贬至今，刚好是“十九年”。去时，刘善充在成都东锦江上置酒送行，因赋此诗。刘善充可能是慎妹丈刘泰之的弟兄，本双流人，寓居成都。“锦津”即指今望江楼附近码头，明时宴客饯送之处，已从江楼上流的合江园改到这里；古代岷江有“五津”，故称此为锦津。《蜀诗》卷四改题作“锦江”，与作者命题之意不符。近代《华阳县志》卷二十七锦津乡条云：“旧志称在治东百里”，亦非明人宴饯之所。“星桥”也是借事造境，当时江楼附近还没有兴建大桥，诗因秦汉时成都“西南两江有七桥”，传言李冰所造，上应七星，故用星桥泛指锦水渡处。

沈德潜《说诗碎语》盛赞慎诗，长于“随物赋形，空所依傍。读《宿金沙江》、《锦津舟中》诸篇，令人对此茫茫，百端交集”。本篇情事，皆出切身感受，久戍南裔，诏还无期，暂归故乡，又当远行，对酒惜别，自有无限依恋。诗虽情调低沉，但生于实境，语少矫饰，自然流露，更觉哀感动人。王夫之就此论其“通首浑成，方是作者。何大复但于句句觅浑，何得不入俗！”李何诸子揣摩初盛唐歌行于字句顿挫、音节流转之间，一部分缺乏生活内容的拟作，往往流于空泛，徒见格调。何大复是杨慎早年的诗友，在研讨歌行方面，各有所得，亦未可全非。

《明诗综》收入此首，颇有删改，“匈奴”作“流离”，“胡马”作“代马”，显然是在清代文网密罗之下，有意减少一些违碍的字面。《明三十家诗选》卷三采用朱氏改本，俱失原意。杜牧《边上闻胡笳》有“游人一听头堪白，苏武曾禁十九年”句，杨慎改“曾禁”为“匈奴”，自喻戍所为边荒民族地区。朱选改作“流离”，已觉稍泛；又改“当筵蜀国絃”前二字作“当年”，更觉不合。当筵是就“舟中对酒”而言，以指别时，当年则指往日，不切离筵赋别之意。乐府相和乐有《蜀国絃》曲，本咏蜀道艰难，此借用于去国就道，眷恋故土乡音；上二字改“当年”，易误为追怀少年游乐。

送余学官归罗江

豆子山，打瓦鼓；阳平关，撒白雨。白雨下，娶龙女；织得绢，二丈五。
一半属罗江，一半属玄武。我诵绵州歌，思乡心独苦，送君归，罗江浦。

此诗原载《南中集》卷二，是杨慎在云南时的作品。写法更为特殊，“全用《绵州歌》，后只缀四语送行，另是一格”（见《明诗别裁》）。陈琳《饮马长城窟》中融入秦代民谣，已有这种篇法。本篇更以民歌为主，续成四句，语言质朴，音节错落，与古歌谣色调相配，不见痕迹，尤难在别出新意，善“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徐祯起《拟古》亦全用乐府“道旁兔丝，何尝可络”一首，只结语添上“人生天地间，虚名固无益”二句，尚嫌接凑，且少新意。

《绵州巴歌》始见《五灯会元》卷十九，南岳下十四世、五祖演禅师法嗣宗泰传中。法演是绵州人，唱的是北宋绵州民歌，用来隐喻禅机，进行神秘主义的说教。座下的涪城宗泰和尚，忽然“顿悟”机锋，便掩住法演的口，不让再唱下去。歌词虽未唱全，其内容基本上已算完整。宋元文人对这首歌谣都没有注意，经杨慎缀句成篇后，流行当时，再收入《列朝诗集》、《明诗综》、《明诗别裁》等重要选集，这首民歌也得广为流传，引起人们的重视，却又对它的时代、地理、名物、比拟，甚至整个内容问题，发生了不同的误解。

明清人对歌谣的时代已多误解。罗江未设县前，本属梓潼郡涪县境地（蜀汉至西晋郡治今梓潼，东晋至梁郡治涪县即今绵阳），北魏改郡名巴西，才把涪县分为巴西、万安两县；唐宋更郡名绵州，并改所辖万安为罗江。歌名《绵州巴歌》正标识它的时代，上不超过唐时，下至宋代尚在流行。就歌中地理看来，似更近于宋。因绵州旧名巴西郡，歌调即用巴西土曲，故称“巴歌”。《蜀中诗话记》云：“《绵州巴歌》巴歌二字才见，此后刘禹锡之《竹枝词》、李绅之《巴女词》，皆其变体。”诗话实指其时在中唐以前，已不甚确；并且“竹枝”是夔州土歌，亦不应从巴西变来。李调元《罗江县志》因李膺《益州记》称罗江为晋梓潼水，便把此歌订为“晋绵州歌”，更出臆断，提前了好几个世纪，至使时代与郡名矛盾。调元又误罗江即古孱亭，亦与歌谣地理不合。《古诗源》归入晋乐府，没有说明原因，《古谣谚》卷七十五是承李调元之说而误。

歌词赞颂罗江水利，就江流所经名胜，加以幻想，采缀成文，使乡土风物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为求确解歌谣的内容，必先明了罗江的流域。罗江发源安县，流经罗江、中江两县，东至三台约八十里会入涪江。文同《梓州中江县新堤记》云：“县为江所环，因名之。其源盖出于绵之龙安（按宋石泉军辖龙安县在今安县东北九十里）鹿爬山，初若二带，其深财渐车，至神泉（石泉军属县在今安县南五十里），始与诸谷溪水会为一。西至于罗江，南至于阳平（今中江县西北三十里），汇东南，复吞旁流，迺浩浩漾为洪波。浮于县之西郊，历坤隅，势颇壮猛，南注，折而东。”英宗治平年间，三万人参加罗江的水利建设，在罗江、中江两县间，修筑五道堰堤，共长百三十七丈，高一丈，宽两丈，使水流就范，因患为利，灌溉两县。

豆子山在罗江县内，嘉庆间李调元修县志时，虽收此歌，未注明山之所在。同治续修《罗江县志》卷五“山川志”才实指“豆子山县东北交中江界，晋歌‘豆子山打瓦鼓’即其处也”。这也可能是后代因古歌而拟定山名，但能符合江流的地域。打瓦鼓不应揣想为形容水声，当依根《五灯会元》解说：法演升堂时，先说了“八十老翁辊（即滚字）绣毬”，大众请他“试辊一辊看”，法演便“以手作打仗鼓势，操蜀音”，唱起这支歌来。仗鼓本是唐宋流行的散乐杂伎，《乐府杂录》称为“三杖打撩”，《乐书》称为“三杖鼓”。王玄策在显庆四年第三次出使时，曾见过“五女戏”，由五女传弄三刀，“手弄三杖刀稍枪等，掷空手接”，与抛舞鼓棒伎艺相同。至于击鼓的表演，张祜《大酺乐》云：“双鬟笑说楼前鼓，两妓争轮好落花”，则是两人对作。落花即指弄杖，后代的“打花鼓”即源于此，也有抛弄三刀的。宋代民间女伎人敲“三棒鼓”，仍然“用三杖上下击鼓”。（见话本《杨思温》及《事物原始》）《古杭杂记》所载“和

尚弄花棒鼓”，也是“以三四鼓棒在手，轮转抛弄”。并见《梦梁录》、《都城纪胜》和《吹剑录》，记叙相同，或又称为“花鼓锤”。法演作“打仗鼓”的手势，即仿当时流行的“三杖鼓”和“花棒鼓”表演。仗鼓既是曲艺名称，瓦鼓便非土制乐器，应指民间乐伎，因演出于村场瓦市之间，故称瓦鼓，犹言村市鼓伎，或直指花鼓。

阳平关原作阳平山，杨慎改山为关，避免重韵，《罗江县志》也随之而改。山在中江县北，宋冯祖轸有《阳平镇府君三郎庙记》（见嘉庆《中江县志》卷十二）。蜀中道教化迹号称二十八治，第一阳平山治，是宋时名胜之地。下句的“撒白雨”，更不是悬流飞溅的形容，而是指过云骤雨，至今四川还称晴空疏雨叫下白雨。旧诗有“云合阳平关，千峰撒白雨”句，正用歌词本意。歌词由下雨打鼓而联想到“娶龙女”，才正式引出罗江流水。

龙女的形象，是从罗江经流龙洞构成。罗江有大霍洞，传为龙洞。《云笈七签》卷二十八：“阳平治、道由罗江水两歧山口入，水路四十里，治道东有龙门，扼守神水”。《蜀中广记》七十二引《先天传》：二十四化各有一洞，龙神血食，“水旱风雨，预关于洞中焉”（又见《太平广记》三十七阳平滴仙条）。洞在罗贯山大霍峰下，距县南十五里（见《蜀中名胜记》九、同治《罗江县志》五）。道家传说妄移阳平罗贯二山于彭州，宋代地志或因此而误以罗江出于九陇。民歌里的龙女，已洗去宗教色彩，成为施风行雨的美丽象征。“织得绢”二句，便是对罗江的美饰。罗江二源，“初若二带”，会于县境东北，“两水相蹙成罗纹”（见《方輿胜览》绵州罗江条），所以称为罗江，又称为纹江。这两支水源，就是从安县塔水场流来的秀水河与安县河坝场流来的安昌水，合流于北寺（详嘉庆《罗江县志》三），以下称为罗江。民歌因二水“蹙成罗纹”，进一步比拟为精美的白绢；改造迷信中的龙女，赋予生活内容，幻想秀丽的江流，是她妙手织成的素绢。

玄武即中江，北周设玄武郡，隋唐改为县，宋大中祥符时才改名中江。中江县东南二水夹流，一为南江西桥河，即罗江；一为东江东溪河，自绵阳来，称中江。二水合于县东南玄武山，南注三台县，东折入涪江（见《大明天下一统志》七十一潼川州、《蜀中名胜记》三十中江县）。

词歌仅此十句，大意已能明白：豆子山前舞弄鼓乐，阳平山上白雨骤过。一片喜气中，迎娶龙洞神女出山来了。罗江如绢，是她织成的嫁妆礼品；江流所经，分惠两县，给生产增添了希望。近人因对歌中地理不甚明悉，影响对内容的发掘，把这支优美的民谣，误认是描写江油窦圉山飞流悬瀑的自然景色，失却了劳动人民歌颂农田水利的喜悦心情。

春 兴

最高楼上俯晴川，万里登临绝塞边，碣石东浮三绛色，秀峰西合点苍烟。天涯游子悬双泪，海畔孤臣谪九年，虚拟短衣随李广，汉家无事勒燕然。

《春兴》八首，仿杜甫《秋兴》，咏怀感事，“语亦多工”（见《诗薮》）。陈文

焘《升菴文集序》以此八篇比之杜甫“夔州以后诗”，正因其风格相类。程封《升菴年谱》据此章“滴九年”句，以为嘉靖十一年作；但各章涉及的事，却不限于一时一地。这是第一首，总起八篇，抒写久废边庭，登楼销忧，江山虽美，闲身无补于国事的感慨。王粲迁逝，登楼赋怀，犹思骋力高衢，气愤胸臆。杨慎谪戍，名为从军，时当边患，却无所用其力，匏瓜徒悬，更有甚于王粲，悲愤之情，溢于词表。

最高楼应指滇中名胜，宜是昆明滇池西岸太华山的“缥缈飞楼，明黔国公沐英建”。因杜甫《白帝城最高楼》：“独立缥缈之飞楼”取名。但历来记载，太华寺楼都没有“最高楼”的专名，诗中用此三字，便成了泛指高楼。所以这样名实不一，亦由于《明诗综》改字造成，《明诗别裁》又出自朱书。费经虞《剑阁芳华集》卷六亦同，疑是清时蜀中传钞改从朱本。明刊《文集》各本俱作“遥岑楼”，应从原作。慎友人永昌张含《次均答升菴春兴长言八句》谓“逐客连然”，已指明此诗的写作环境是在安宁，不在滇池。下文自称“海畔孤臣”，谓居环海州县，亦不拘泥于必在海边。杨慎戍滇，自嘉靖四年春赴永昌军营报到后，因得巡按御史郭楠和永昌知府严时泰的照顾，即寄居安守法华寺附近的遥岑楼上（《大清一统志》三六九：“法华寺在安宁州东洛阳山，大理段氏建，中有遥岑楼”。《新纂云南通志》四十八：“遥岑楼在（安宁）城东，为迤西咽喉，明杨慎尝讲学于上”，不言楼在寺中，与杨慎集中所见地望相合）。慎父杨廷和《寄王白菴太守》：“寄谢安宁贤太守，遥岑新建慰吾儿”指此。楼本前代名胜，所谓新建是新加维修，暂作慎寓。稍后，四川巡抚“遗百金为旅居之费，太史建居，题曰李公楼”，园名云峰山馆，才有私寓。到嘉靖二十六年又移家滇池高晓的海庄别业，此前约二十年都以云峰为寓所。

“碣石东浮三绛色”一联，咏南中胜迹及其游踪。张含次均：“昆明东畔点苍西，问柳寻花春不迷”，意正相符。碣石见《贡禹》：“至于碣石，入于海”。这里用以借指滇海东面的山峦，犹《高唐赋》的“浮海而望碣石”，通称沿海山岳叫碣石。“三绛”二字似有讹误，汉三绛县故地在今会理南境，远隔滇海以北，与“东浮”不合。滇中名山与绛字相关的，有“乌龙山，在禄劝州东北三百里，一名绛云雾山”，即唐南诏异牟寻割据僭号日东王时封的东岳。此山不但地位异向，如改称绛云雾山为三绛，则是生造名词。疑“三绛”是“三雾”之讹，即敕雾山的译名，或能得其所。杨慎《云南山川志》：“敕雾山在嵩盟州东四十里，世传蒙世隆征乌蒙得四女，归至此山，四女遥望故乡，俯仰叹息，山巅雾结三峰。蛮谓三为敕，雾为雾。其山嵒独峻，登眺则云南悉在目中，又名峻葱山”（明清一统志并同）。诗咏“三雾”，境地俱合，山当滇池之东，浮现云际，宛如临海。万历间编订本集，不悉南中名胜，误为习见的“三绛”，至使意不能明。

末联变用杜甫《曲江》：“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但非泛语，实有所指。张含次均云：“忽来西徼有风烟”，指边境叛乱。《明史·世宗本纪》：嘉靖六年二月“小王子犯宣府”，七年三月“讨云南叛蛮”（指凤朝文安铨叛变围攻昆明），十二月“小王子犯大同”。慎后辈成都人周逊《和升菴春兴诗》亦云：“天涯防守旧山川，胡马何因更入边，每见诸公忧社稷，岂无一士靖烽烟”，更能发明原意。慎因边徼

多事，尤苦闲废无聊，既为戍卒，拟随军远征，扬国威于边庭，如班固勒铭燕然，竟不可得。《艺苑卮言》云：“予少时见传杨用修《春兴》，未联云云，甚美其意，为之击节。”即赞赏其积极用世之情。《明诗别裁》亦称此首：“忠勇之气至欲托之从军，读者可以悲其志矣。”揭示了杨慎内心的苦痛。

天上风云此际多，山中日月竟如何？争传鸣凤巢阿阁，又见飞鸿出罟罗。
宣室鬼神思贾谊，中原将帅用廉颇。难教迟暮从招隐，拟把生涯学醉歌。

这是《春兴》八首之二，细绎诗意，写的是嘉靖六、七年后政局的变化。首四句即分别对写朝事的巨变与切身的利害，征信史迹，历历可寻。

张璁因迎合世宗旨意和适应皇族宦党夺权的需要，嘉靖六年得预机务后，阴谋陷害所有内阁旧臣，指使爪牙诬奏致仕杨廷和、费宏等，并及廷和子婿，欲兴大狱，根除异己。一面罢黜御史、翰院四十余人，换用亲信；一面请录先年被谴诸臣，藉以收誉树势，唯议礼中被滴戍诸人不得赦免。嘉靖七年，由张璁桂萼主修的《大礼全书》成后，世宗亲撰序文，赐名《明伦大典》，六月“颁示天下，定义礼诸臣罪”，以杨廷和为首，重加惩罚，并揭榜承天门，以昭儆戒。这场斗争已基本定局，明世宗便假造祥瑞，粉饰太平。史载：嘉靖七年四月“甘露降，告于郊庙”；八年十一月祷雪，“亲诣郊坛告谢，百官表贺”；十一、二年，四川及河南巡抚各献白兔白鹿，“自后诸瑞异，表贺以为常”。群臣歌功颂德，争献谀词，诸如“黄帝轩辕凤凰巢阿阁”一类的方士讖纬之说，宣传开了。本诗一、三两句，讽喻朝事，意自显豁。

在这样的风云遽变中，杨慎更感到徬徨，“幽独处兮山中”，将来命运如何，尚难预料。他空见“飞鸿出罗”，自己继续遭贬仍在罗中，不但感到失望，并有种种隐忧。继以其父割籍治罪，自己能得赦的希望便更渺茫。事实也是如此：八年十月刑部员外郎邵经邦上疏论救，十年十二月御史喻希礼、石金请宽议礼诸臣，都受到下狱和滴戍的惩治。杨慎从他父子的处境，联系到旧阁臣僚的永被废弃，所以在第三联中，接着指出：赵王思用廉颇，汉帝召还贾谊的事，已不可能再有了。诗亦变用杜甫“今日朝廷须汲黯，中原将帅忆廉颇”句，说明世宗已无录旧之意。

在此绝望处境中，杨慎却不甘于避世从隐，借用《楚词·招隐》：“山中兮不可以久留”，表示心情的矛盾。但又明知得赦无望，如刘长卿诗所云：“生涯岂料承优诏，世事空知学醉歌”。这个“学”字，带着许多勉强被迫的痛苦。醉歌不仅视为“销忧者莫如酒”，更难堪的是借此逃祸。隆庆间泸州朱茹在《杨升菴诗集序》中，书录旧时见闻：“用修之滴戍也，世庙每询于当国者，赖以猖狂废恣对。已又询不置，将物色之，祸几及。于是用修闻之，惕然股栗。”世宗恨恶之深，以至暗探其言行，欲置之死。杨慎尝云：“孤臣白头困尘埃，官里犹询小秀才”，正指此事。因此不得不逃命于醉歌狂废的生活，在答重庆太守刘绘的书中，更淋漓倾吐他的愤懑不平，“亦聊以耗壮心遣余年耳”。

《内江地区汉语拼音文字试验方案》说明

为了早日完成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提出的“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的共同拼音方向”的伟大历史任务，使我国文字改革工作尽快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飞跃发展，我们在原《汉语拼音方案》的基础上设计了《汉语拼音文字试验方案》。

《拼音文字试验方案》设计出来之后，在地方党委的领导和部队党委的支持下，我们遵照毛主席“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教导，前后用了几个月时间，分别在四川省内江县、市部分工厂、农村、学校的六百多人中进行了汉语拼音文字试点。通过试点，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积累了第一手资料。我们较为广泛地听取了人民群众的意见，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对这套方案进一步作了研究和讨论，并进行了修订。所以，现在这套方案是人民群众在实践基础上的集体创作，已不是少数人的意见。这套方案修订后，又经过两千多人的学习实践。在此基础上，内江县委召开了文字改革座谈会，邀请四川省有文科的各大专院校的同志们参加了座谈讨论，再次作了部分修改。在这里，我们对这套方案的设计作个必要的说明，供上级领导机关、各院校以及一切关心祖国文字改革的同志们和朋友们共同研究和讨论。

一、汉语拼音文字的设计原则

对于怎样才能设计出一套适合我国情况，使广大人民群众都满意的汉语拼音文字，我们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开始，我们受汉字的影响较大，从汉字的偏旁、部首的启示中，想制作一种能“望文知音，望文知义”的汉语拼音文字。但是，结果很不理想。以后，我们又受词儿连写的影响，想作词儿定型的尝试。但经研究后，觉得也有两个东西不好办：一是分词标准问题，这是专家们争论不清的问题；二是即使标准统一了，把单音节、多音节定型词儿加在一起，数量空前，令人望而生畏。实践使我们认识到，要想设计出一套广大工农兵群众都感到理想的汉语拼音文字，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周总理和鲁迅先生关于文字改革的指示，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言学理论；研究汉语、汉字特点和我国文字改革的历史经验；认真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只靠盲目的行动和少数人的瞑思苦想，是永远不可能办到的。从此，我们一面学习，一面调查研究，重新考虑我国汉语拼音文字设计的路子。

在设计汉语拼音文字上，主要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是受原汉字表意文字框框的影响，主张制作音义文字。而音义文字的致命弱点是：有限的义符难以表现无穷的思想色彩，固定死的表义文字不适应语义的演变。一种是受西方词儿连写的拼音文字的影响，

雁飞曾不度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
日归日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

简绍芳《升菴年谱》载：正德十四年“巳卯继室得遂宁黄筒肃公珂女”。慎继娶黄峨，字秀眉，嫁时年二十二。嘉靖五年廷和寝疾，慎自滇归，“七月携家就戍所”。八年廷和卒，“纪纲家务，以付慎继室黄氏”（语见赵贞吉《杨文忠公神道碑》）。此后黄峨即留新都，隆庆三年卒，年七十二。

《艺苑卮言》云：“杨用修妇亦有才情，杨久戍滇中，妇寄一律云云。”黄峨能诗，始传此篇。但“诗不多作，亦不存稿，子弟不得见也，”虽慎从子有仁也没有见过她的诗稿。隆庆间，俞宪辑成《杨状元妻诗集》一卷，实只三首，并误峨为王氏，成都人，其得之传闻可知，甚至将梨园旧曲误入峨集，慎友人已辨其非。万历间蜀中所传，别出五首；江南所传，又增二首，膺伪杂存。明清选集更无溢出此十首以外之作，比较可靠的唯此首及简绍芳《西巖诗话》所引“才经赏月时”等篇。《阁剑芳华集》谓：顺治间有坊刻黄氏诗集百余首，实多散曲，否则不会骤增至此之多。后代误传，峨有诗集二卷，是展转意测而成之数。

王昶《滇行日记》：“访升菴谪居故址，今为甲杖库。入视之，有楼三楹，颓坏不可憩矣。楼下有人书黄夫人三春花柳律句，庭前有桃数株。余作诗云：朝阳楼阁上，独照断肠篇。”杨慎在永昌的故址，后已建为祠，乾隆时用兵边境，改为军装库，以后又重建新祠在太保山。峨寄慎诗，明时即已盛传，故曾刻于旧祠；明清选集几无不选录，题目字句彼此异同。首句“衡阳”与腹联重韵，高泽外改作“衡湘”。王鸣盛等认为改字较安，但选集皆仍存旧。

全诗多融铸旧句，“袭故弥新”，自成名篇。朱彝尊举出一三两联，本出郎士元送李敖诗：“莫信湖湘书不到，年年秋雁过巴东”；黄庭坚寄苏轼：“美人美人隔秋水，其雨其雨怨朝阳”（上句本杜甫，下句出阮籍）。其实第一联更近于高适送人贬长沙“衡阳归雁几封书”，而加以变化，谓慎远在衡阳之外，寄书尤难。第三联又改旧句，用《采薇》日归日归，与下句《伯兮》其雨其雨成对，同是《诗经》征人思妇之词，使事最工。未联用汉乐府藁砧刀头的隐语，恰如其分。结句亦出李白《流夜郎》诗：“我愁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放赦还。”因其作法较奇，顾起伦怀疑“似用修代内作，以其思多深僻也”。这个看法，具有一定的理由，但不得遂以为非峨所作。对此类艺林传诵已久的名作，虽有疑点，还应采取审慎态度。点化陈句固是用修所长，并不排斥峨诗经他润色修改的可能。

长洲熊涓《寄远》云：“几回闻雁忆连然，天末遥将锦字传。万里飘流羁远客，十年迢递隔回船。浮云目断苍山外，落月魂消洱海边。何日刀环遂初约，免教暗卜掷金钱。”此诗仿拟黄峨之作，用事造语亦颇工整。